

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NICHOLAS POPPE'S STUDIES OF
MONGOLIAN HP AGS-PA SCRIPTURAL LANGUAGE

译注解补修订本

郝苏民



民族出版社

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NICHOLAS POPPE'S STUDIES OF
MONGOLIAN HP AGS-PA SCRIPTURAL LANGUAGE

译注解补修订本

郝苏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培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入门/郝苏民译注解补.一修订本.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7

ISBN 978-7-105-09487-5

I. 鲍… II. 郝… III. 八思巴字-研究 IV. H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639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13.5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45.00 元

ISBN 978-7-105-09487-5 /H·655(汉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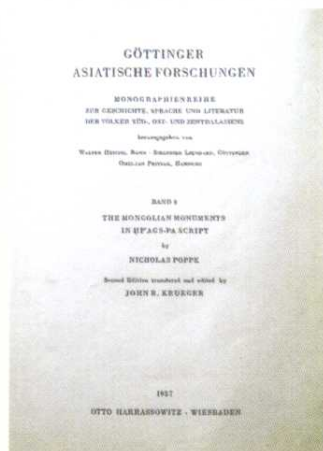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蒙古文发行科联系退换
(蒙古文室电话:010-64228166;蒙古文发行科电话:010-58130938)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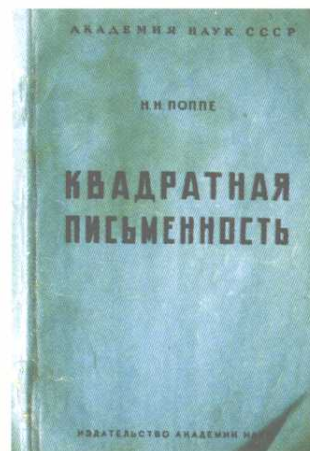




阿尔泰学泰斗 N·鲍培
(1892 – 1991)



鲍培《八思巴字蒙古语金石研究》英文版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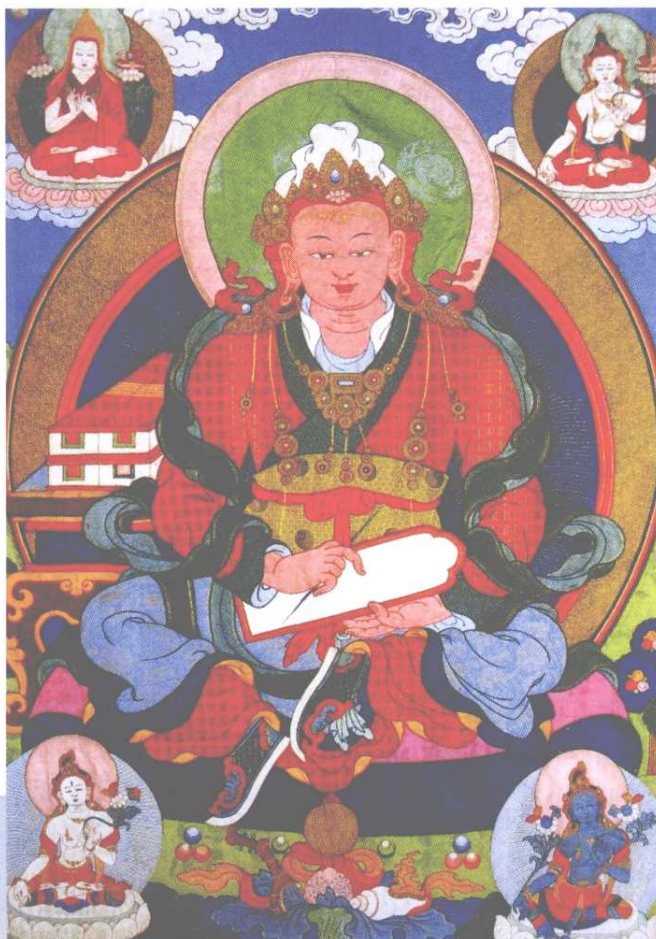
鲍培 1941 年出版的俄文版《方体字》



鲍培与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等在一起



西藏萨迦寺八思巴镏金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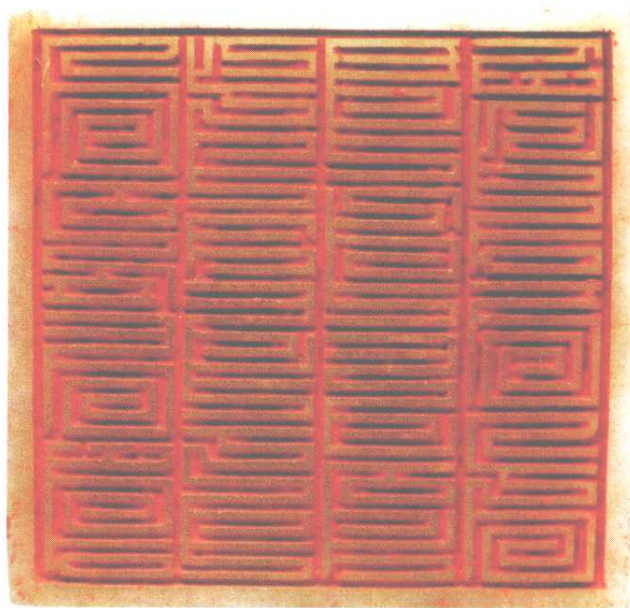
蒙古国国立美术博物馆馆藏
八思巴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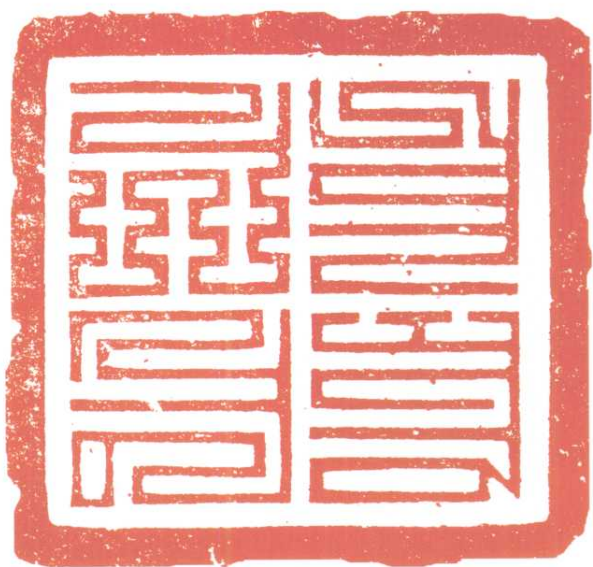
八思巴拜见忽必烈图

扎西伦布寺清代壁画，描写元代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召请八思巴，并奉其为上师的情景

下印外形系双龙盘纽白玉印。
印文是八思巴字藏语。音译义
如印下说明文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本印采自《西藏瑰宝》朝华出版社 2000 年



白兰印



甘肃发现的1372年(宣光二年)
《中书右司都事厅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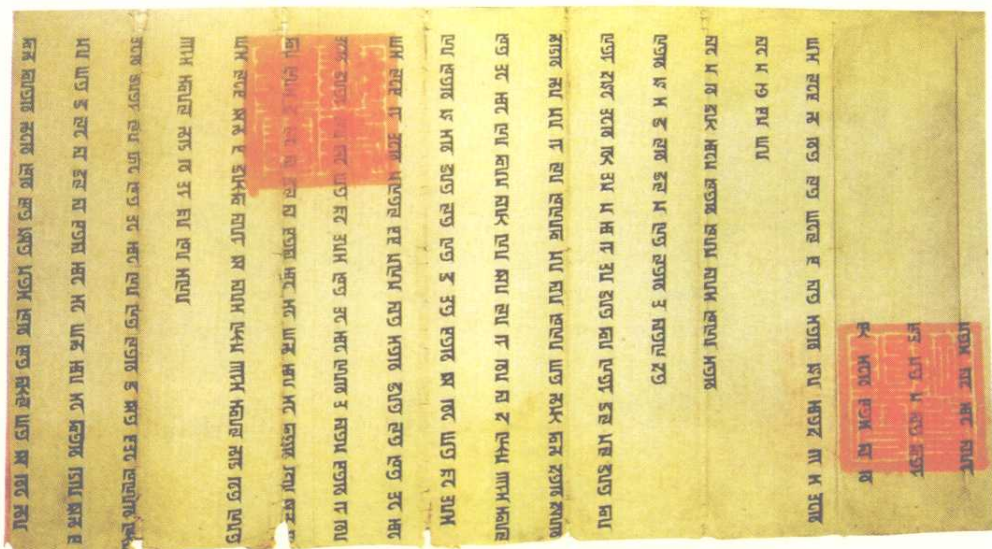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八思巴
字蒙古语镀银牌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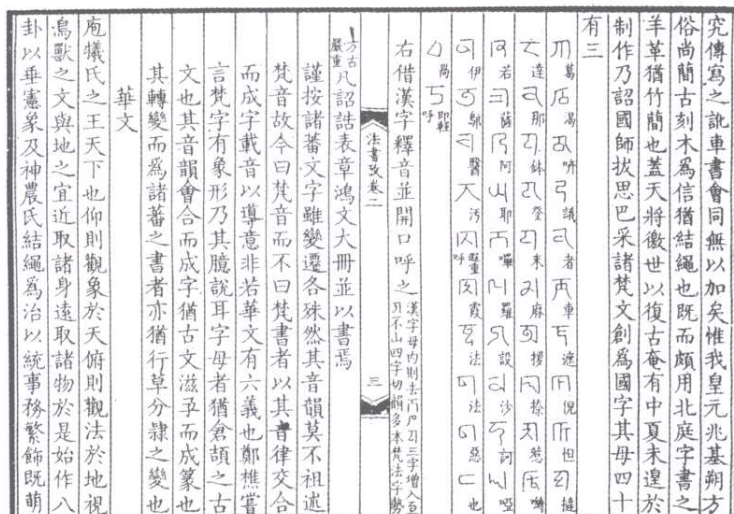
西藏收藏八思巴字蒙古
语镀银园牌符



内蒙古大学收藏索伦金制八思巴文长牌



西藏收藏：也孙铁木尔皇帝 1328 年圣旨(采自《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古籍《法书考》之又一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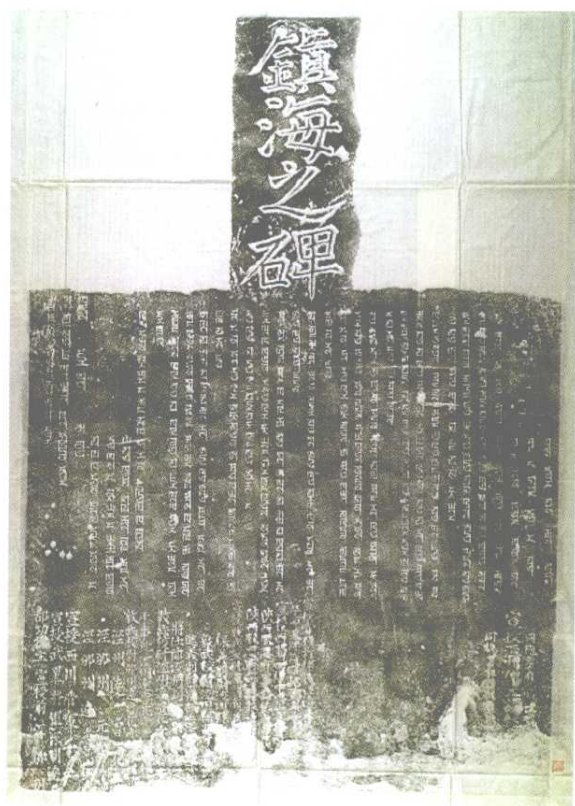
元铜币“大元通宝”八思巴字汉语实物拓片



扬州出土八思巴字蒙古语、波斯语铜制园牌



西藏收藏：妥欢贴睦尔皇帝 1345 年圣旨(采自《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收藏《1298 年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八思巴字蒙古语碑》



甘肃敦煌莫高窟六体文碑八思巴字梵语



代替波果托尔牌子的
翻拍照片



米努辛斯克、纽克牌子的翻拍。“本牌来源于Yule版《Travels of Marco Polo》一书，编者：Cordier Volume 1.伦敦：Murray。1921年。352 页后。（Half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original）此照片的比例为原件长、宽的二分之一。文物原件出自东西伯利亚。”



八思巴字蒙古语园牌翻拍



四文铜质圆牌

新版自序

一、技术与学术

适逢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将在中国召开,本书得以修订出版,对我说来是终于可以稍稍了却长期夙愿的一件心事,我感到一种力争修正、努力尽责的释怀。

本书中文初版名为《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是语言学界公认的阿尔泰学泰斗、国际蒙古学界著名学术大师 Nicholas Poppe 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于1986年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献礼而出版的。其时在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任负责人之一的乌恩奇先生及其相关朋友,在当时排版、印刷和技术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此耗费了至今让我铭记于心的心血!同时,只因受惠于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蒙古文字学家包祥教授为首所设计、创造的八思巴字母、符号的铅字排印技术,也才使我实现了中国人对鲍培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所利用的八思巴字“替身”(Transliteration),还原印刷成八思巴字原体的愿望,以便于中国新一代初学、研究者的视觉和观感上的认知与认同。因为鲍培先生有言:“中国是八思巴字产生的地方”!

当年,鲍培八思巴字原体“替身”被拟成至今已有80年左右的历史,在“替身”问世半个世纪后,中文初版首次恢复了八思巴字原体(尽管字体本身出于技术条件所限还有字母间连接留隙等不尽人意之处),从那以后,时间又过去了22个年头,印刷科技、尤其电脑录入技术的成功,都非昔日情景可与之同日而语!但出于其时技术条件和个人受制于客观而造成校对的不精、印刷成型上的低质;文字、符号、音标等的错讹,误译、缺漏,原有图版印制上的失效或逊色等等,也使我长期背负着深感汗颜的痛苦而不得释然!我个人也已从当时“知天命”之年重新获得平等拼搏权利而钻入人生隧道,一口气奔到“古来

稀”之此岸。这一次所幸没离开过高校。期间刚从“十年动乱”后获救伊始,我便又再度忍痛送走未及同甘屡经共苦的伴侣!此后有一度比较顺利地获得与攻读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们朝夕相处的机遇,总体上加入到始终为学科重建,为培养新一代人才度过了20多个日月春秋。除去新的“必然”困惑、苦恼外,为教为学上可欣慰之事亦不可谓之无。那么,学术著述上因我传薪造成客观所致的失误与缺陷,于做学言是难以“解压”的;就今日科技言,亦无“所限”之类可借以口实的。——这是出版这本“译注解补修订本”的原因之一。

二、学术与大师

1986年,我曾说:“近年来我国蒙古学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研究方面,情景是十分鼓舞人心……我的这部不成功的译补本,就权作我国青年蒙古学者们的急就之用吧。”22年后的今天,按理说来,这部“不成功的译补本”早已经完成了“急就之用”的任务,为何再有“译注解补修订本”出版之必要?

答曰:除首段里已表述过的诸如,铅字八思巴字本体上差强人意的技术性瑕疵外,总体文本中无论哪种文字:叙述的中文、补充的八思巴字、中国蒙古族现用的(所谓胡都木)文字等,原著中(八思巴字读音)的转写符号、引文里的俄文、英文,以及“评注”、“文献目录”、我所补充材料之一“鲍培著作目录”里的其它诸如藏文、德文、法文等文字符号里的各类错排、误排、漏排、倒排等,以及我原出于好意所插入的图版,也因受技术、投入资金所限,而印制成大多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黑团等弊端。另则,当时逢厄运突袭,子女真乃祸结衅深,自己更是“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竟也完全陷进寅恪先生前辙之状态中。是学界友好助我了结初版后期之未尽书事的。凡此,都不该再遗留下去而无校正,有负于学友;有负于后来者!

更重要的是,虽然初版书编译时,除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1959年,科学出版社,127页)[按:2004年又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增订本,共262页]、蔡美彪《元代

白话碑集录》(1955年,科学出版社,133页)和亦邻真先生有独创见地的论文外,作为在中国非语言专业者的我几乎没有八思巴字蒙古语研究方面任何可资借鉴的先例,况且,这事完全是在60年代被“锻炼”于甘南甘加牧区困居破败甘坪寺内期间,无奈“甘坐板凳十年冷”的“闭门造车”,纯属没有参照、求教、查典下“三岁牛犊”的蛮干,不谙规范,用语不确、不精,误解、误译等等实成难免!

本书初版问世以来这22年里,照那斯图先生除1991年在日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印刷发行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文I研究文集》(169页)和《II文献汇集》(228页)二册外,还发表有专题论文;2004年内蒙古大学呼格吉勒图教授与其研究生萨如拉编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作为“阿尔泰学丛书”之一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537页)。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人的学位论文和专题论文。这些新成果,有力地证明了鲍培老人25年前所言的准确:“中国是八思巴字产生的地方,那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献(包括八思巴字写成的)。中国学者,当然会极好地组织起来深入研究那些材料。”照那斯图、呼格吉勒图两教授结集的成果以及不时来自中国四面八方报道出土八思巴字金石印章等文物的信息,说明中国的确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献”,它不断为我们不仅仅提供着历史语言研究的实物资源,而且,从历史民族志的角度看问题,八思巴字遗产也为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宗教学、文化语言学等研究,提供着极具中国经验的实证资料。诚如李学勤先生言:“现在的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都有密切联系,是一门成熟的,有自己的范围和方法的独立学科。”(《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如果说鲍培在80多年前根据西伯利亚出土的几件牌符(仅三类4件)和流失于海外的有限碑铭石刻拓片与残叶文书遗物(亦仅三类9件),却写出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言的其时最全面、系统“很有价值”的概论性专著!自然无庸讳言,25年来我们这些丰富成果的“文献”属性,也为我们提示着鲍培希望中国学者“深入研究那些材料”的愿望,事实上我们仍然是处在面对丰富文献而深入全面系统研究不足的状态,这不能不是一个很让人感到几分“不好意思”的憾事!

看来1981年杨耐思和照那斯图先生合写的《八思巴字研究概

述》一文中的所说：“……那么在拼写蒙古语资料方面八思巴字研究水平的代表则是波普(鲍培)”；“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到现在的半个世纪内，八思巴字学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写蒙古语的八思巴字研究和探讨古代蒙古语的问题方面，则没有多少进展，一般来说，仍然停留在波普(鲍培)的水平上。”

此言极是！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语言学界或蒙古学界，是否已经出现了在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方面超越鲍培水平的成果呢？我国工程性的好消息不断有闻，我们的期待也是怀有信心的。但因眼下尚未得到国外的新著，国内贤达们的系统成果也尚无披露之前，我们仍然认为鲍培的这本著作至今“对八思巴字本身的体系，第一次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说明，对于人们学习、了解、研究八思巴字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参考书”(照、杨二君之语)。况且，就为学之道论，中西一理，多些供时下学子可体会非浮躁治学系何为，亦是“功德”。大师之为大师者，如斯人——这是出版这本“译注解补修订本”的原因之一。

三、治学与方法

我们这个新时代所创造的一切高新科技，造福人类，也给中国学者带来福祉；社会飞跃发展，生活节奏加快。是出于求贤若渴？还是误在拔苗助长？抑或求名心切？当今人文与社科学术在高校，从科研项目的获得到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制度，往往把往昔成功的传统与经验，统统以“改革”之名扫荡以尽。结果是因急于追逐“成果”、主管者的政绩，加上工资、乌纱之诱，这便有效地助长了理工科式的“量化”泛滥；包工头式的计件承包；科研的二手转让；课题的追时完成；论文以量计绩等现象不一而足。学术风气浮躁，弊端叠出，贻害有加！针对“惜墨如金”的传统，当前是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原创性成果让位于低水平重复的大部头。窃常设想，80年前无电脑可上网下载的鲍培先生，若处于这般学术环境下，关于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的著作能在他这个“老外”手中问世吗？不说昔日八文文物珍稀；中国汉文文献对西洋人翻译读懂的艰难程度；单就已知的几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献

语料,非锈蚀、磨砺不清,即残缺破损漏失,欲从中归纳、综合、复原、构拟八思巴文字时代的蒙古语语音、构词、语法体系;仅就一个个八思巴字蒙古语词的历史词义——背景文化内涵的探究、辨析、比较、选择、翻译和最终拟定,其纷繁复杂的程度,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力和韧劲,是难以奏效的。有君如若置疑,请看看本书中,鲍培先生在“对原文及译文的评注”所下的功夫吧!仅仅对一切“令旨”中开首那句公文例行“套语”中的每一个词:如:[moŋ k'a]、[dɛŋri-yin]、[k'uɕ un-dur]之类,在“评注”里,总是对其词义与格变的文化内涵力图推敲到极致程度,为此广征博引,不厌其烦。他指出:“翻译家们多注重词语形式上的准确翻译,而疏忽了它本身含义的翻译。”鲍培在横向比较、评述各家用不同语词来对应原词的得失时,也同时纵向地利用蒙古语族语的词语实证他的观点。这令人想起当代文化语言学家们的理论。即:除了活的语言外,还关注语言的历史、语言的书面形态;除了了解语言的现状外,还希望了解语言现状背后的原因。鲍培正是这样,他对词语的考证、推敲、翻译上的阐释、认知、等质的追求,体现着他的语感、历史的纵深感和人类学的细描品格;他并非仅仅一个语言学家,他有着人类学、文化学的精湛学养和操作的驾驭。这对现时操母语的人来讲,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繁琐考据。其实不然,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 1884—1939)的经典语是“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

这是一种人文学者所应具备的学养、品格和实践精神。这也令人想到日前任继愈先生针对北大严教授成果时所说“现在中国学术界学风浮躁,严绍璁是二十年磨一剑,可我们有一些学者是一年磨二十剑,甚至三十剑,真令人担忧”。

目前中国源于“官本位”的学界浮躁与腐败,大有“文化化”之势。高校学术教育的学风不正,正通过学者谋仕、职权的诱惑,窒息着创新的灵魂、麻痹着创造的活力。

鲍培在这本书里所表现出的一个人文学者所具有的探索方法和治学精神,正是我们时代目前新一代学者身上所需要学习的。这当然